

15

山东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六辑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415-106

山东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济南

封面题字：启 功
责任编辑：马素珍 弓 强
封面设计：王秉东

山东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军区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8.5印张 185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09-00562-5

K·57 定价：3.25元

目 录

- 怀念蔡际霖先生……………吴鸣岗（1）
- 回忆1902年——1916年的
 山东师范学堂……………蔡际霖遗作（9）
- 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杨希文（23）
- 三十年代的山东大学……………柳即吾（31）
- 山东大学1946年——1947年学生运动
 的回忆……………刘冠文（37）
- 从抗日流亡到投身革命
 ——原山东一临中进步活动纪实
 ……………陈悦 蒋向红 宫世韬（61）
- 杨氏海源阁藏书记略……………范景华（80）
- 朱雨辰从文和堂书局到鲁东
 文化社与胶东文化社……………朱鉴明（98）

革命的道路 战斗的歌声

——忆李淦同志……………蒙 沙(106)

革命音乐家——安波……………刘清英(123)

人民艺术家王大化……………宋伯良(137)

回忆我的父亲朱树屏……………朱履冰(148)

朱树屏年 谱……………徐言年(158)

电子计算机专家王正同志……………于天助(170)

解放前山东医学教育的演变略述……………姜维翰(174)

解放前烟台医疗业概述……………李伯南(179)

记耳鼻喉科专家孙鸿泉教授……………郭慎涓(184)

名中医吴少怀……………王允升(190)

我所知道的何思源……………王振中(193)

何思源任山东省政府主席 前后……………丁岚生(207)

回忆父亲何思源……………何理路(234)

忆胶南县社教运动之一角……………任君默(250)

怀念綦际霖先生

吴 鸣 岗

綦际霖先生（1887—1969），名宗杰，是济南有名的教育家。他与我父亲虽无交往，但彼此知名，互相景仰。我的表姨父赵凤村先生与綦老在山东高等师范学堂是同班同学，友谊深厚。山东高等师范学堂后改为山东第一师范，由大专性质的学校降为中专性质的学校。我在1933年毕业于山东一师初级部。论资排辈，綦老是我的父辈长者，我是晚生后辈。但是，綦老对我从来没有摆过长辈架子，始终是热忱关怀，提携扶助。特别是当我遇到困难时，綦老冒危险、履艰辛，千方百计帮助我解决困难。綦老对我的帮助，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綦老与我共事，开始在1941年。这年冬天，当我正在北平燕京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聚精会神地写大学毕业论文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寇封了燕京大学的门，我狼狈地奔回济南家里。在沦陷区，一个青年学生不上学，又没有职业，赋闲在家是很危险的。汉奸、警察和保甲长等狗腿子三天两日跑到家里“查户口”，盘问这，盘问那，总认为你是在搞抗日活动，起码是思想上抗日，是危险分子。这时我家的经济情况也每况愈下，我父亲逝世已十多年，我上高中、大学又花了不少学费，家中积蓄已消耗殆尽。家中老母、弱妹，再加上寄居我家的孀姐孤甥，一家四口皆须我一人供养，而当时又物价飞涨，生活实在困难。这对我一个二十几岁的

青年来说，国难家愁一齐压到头上来，这是从出生以来最愁苦的日子。就在这个时候，蔡老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不顾我还是一个没有大学毕业文凭的学生（而且是日寇封了门的大学），主动聘请我到他任校长的私立正谊中学去任史地和英语教员。一天（具体的日期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是一个天气很冷的傍晚），蔡老冒着严寒，由我的亲戚赵凤村老先生陪同，亲自到我家来了，赵老先生对我说，他曾向蔡老说过“鸣岗是自己人，理应他先来拜望你这位前辈长者。不然的话，通知他到学校里见面，也就可以了。”而蔡老却坚持要亲自“登门敦请”，说这才叫“尊贤之道”。这真使我感动的手足无措。这天晚上，我与蔡老第一次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深谈。通过这次谈话，我才深刻理解了蔡老对全国和全世界局势的认识、立场和他的办学思想，从而产生对蔡老十分崇敬的心情。我们先谈了国内的形势和世界形势。当时，国内因国民党蒋介石施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日寇对蒋介石施行诱降，而以重兵疯狂地扫荡解放区，抗战正处于艰苦的阶段。太平洋战场上和欧洲、北非战场上，日寇与德、意法西斯势力接连得手，气焰十分嚣张。蔡老和我都认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中国绝不会亡国，抗战必胜，而全世界总的趋势是走向进步而不是走向反动。在这一点上，我们深感同心。我于是向蔡老倾诉我心中的苦闷。我的意思是我国正处在一个空前伟大的历史时代，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不能走向抗战前线，痛感辜负了时代赋予自己的责任。我还谈了在燕大学习时，我的老师、著名的历史学教授、《中华二千年史》的著者邓之诚先生对我说的：“我们这些偷生在沦陷区的中国人，只有加强钻研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才能坚定这样一个信念：曾经创造过这么光辉的文化，

对人类的文 化有过这么伟大贡献的中国人，绝对不会亡国！书生报国无门，只有如此而已。”蔡老很赞赏这个说法，他说，思敏老先生（私立正谊中学的创办人）在济南沦陷后，坚决不做汉奸教育部门的官，却千方百计地要使正谊中学复校。这一方面是为了使正谊中学的校舍、校界、图书、仪器等等不至为汉奸学校吞没，更重要的是在教育阵地上为国家努力保存一片干净土地，不让奴化教育污染了整个教育阵地！我们的力量就这么大，能对奴化教育抵制一分，就是报国一分，能抵制十分，就是报国十分。莫谓“书生报国无门”，这就是报国之一条路，起码是无愧于自己的爱国心。蔡老还谆谆教导我，面对日寇、汉奸这帮恶毒的人，抵制奴化教育要十分谨慎、机智，不能露骨地、信口地讲，否则，便是冒险行为、愚蠢的行为。譬如讲历史，讲到日本是受了中国文化的熏陶、影响，才开始从野蛮时期进入文明时期的，这样，不用添枝加叶，只是如实地讲历史事实，很自然地增加了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无形中抵制了奴化教育，还不让汉奸们抓到岔子。我问，如果形势所迫，非硬逼你讲日寇汉奸的谬论不可时，应怎样应付？蔡老说，可以用“指出来源，照本念经，念完就算，不加发挥”来对付。所谓“指出来源”，就是说先讲这是“皇军”讲的，“现在政府当局”讲的，或“报纸上是这么登的”等等，然后照本子念，念完就算完了，不再多说别的。当然不能正面批驳，但也绝不正面发挥。这样做的意思是让听的人明白这一套胡说八道是日寇汉奸的心意，我只是告诉你就是了。中国人心不会死的，会有很多的人能领会我们的苦心的。蔡老的一席话使我很受教育，我深感象我这样一个青年学生，在险恶的环境里，初次离开学校走向社会独立谋生就遇到这样一位完全可以信赖

的长者来扶持帮助，真是幸运。

王大彤同志是1935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在1934年冬患严重的结核病，卧床在家，“七·七”抗战后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他本是北京中国大学的高材生。到1939年病体刚刚康复，蔡老便聘请他为正谊中学的语文教员。

杨德斋先生是美国卡林那大学的化学博士，齐鲁大学的化学系主任，后来又任总务长。“七·七”抗战后齐鲁大学南迁四川成都，杨先生是济南齐大留守的负责人。太平洋事变后，日寇占了齐大，把杨逮捕起来，囚禁了三个多月，后来释放出来，又勒令他足迹不得出济南，蔡老先生聘请杨为化学教员，因他善于理财，又请他担任会计主任。杨的侄子杨清波同志当时在解放区从事革命工作，蔡老对此是清楚的，他本人的侄女蔡秋若同志也正在解放区担任妇教会的领导工作。

1943年春，赵丁夫同志应蔡老之聘来正谊中学任语文教员，当年秋季才离开。赵丁夫同志是奉中共山东分局城市工作部的指令到济南来，以正谊中学教员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革命活动，开展沦陷区文教界统战工作的。他来后，首先为王大彤同志恢复了组织联系。接着杨德斋先生的侄女杨淑贞（也是中共党员，参加革命后改名鲁光）也到正谊中学任教来了。从此，正谊中学开始有了党的地下组织。他们在蔡老的掩护下，逐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团结、教育了一批教师和青年学生，培养了一批革命者和革命同情者，扩大了党的外围力量。有一批青年学生就在这个期间陆续进入解放区，直接参加革命。例如赵义平、姜千里、王德馨、袁行云等，后来都成为党的好干部，现在，作为党的文教战线上的

骨干力量，仍然在努力工作着。我本人也是从此开始，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学习革命的理论 and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力所能及的地方，或多或少地为革命贡献了一点力量。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国民党政府派李延年以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山东挺进军司令的身份来济南受降。随之而来的是一批所谓“劫收”大员，其中有抗战前的正谊中学的校长路孟凡。路这时的官衔是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少将政治部主任，他以衣锦还乡的姿态到正谊中学巡视了一番，那时他丝毫没有再回正谊做校长的意思。哪知好景不长，1946年年初，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撤销，济南新设立以王耀武为司令官的徐州绥署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李延年调苏北。

“一朝天子一朝臣”，除了少数军事骨干随李延年南调之外，其余的官员们只好作鸟兽散，路孟凡这个政治部主任也不例外。这时他想起了正谊中学，因他估计国民党要召开国大，想通过当选上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以谋在政治舞台上“东山再起”。当一个校长，可控制一部分学生的选票，所以，路蛮横无理地要慕老把正谊中学的校长位置让给他。慕老当然不在乎什么校长位置，遂毅然离开正谊中学，到济南私立立达中学任教务主任（立达的校长是陈会文，他也是慕老的晚辈，又在正谊中学任过语文教员，当然热烈欢迎慕老去）。我也从此离开了正谊中学到济南第一临时中学去任教员。赵丁夫回解放区后，杨淑贞也回去了，只有王大彤同志根据党的指示，继续留在白区从事地下活动。他以济南第二临时中学教员和《山东公报》的编辑为掩护，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和争取革命同情者的活动，与我经常联系，传达党的指示，分析形势，研究工作的具体步骤，积极活动。

1946年6月初，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背信弃

义地撕毁了政协决议，调集重兵，大规模地侵犯解放区。解放区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起自卫，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了。济南的国民党当局于6月11日出动了大批军、警，在全市进行大搜查、大逮捕。一个星期之内，全市约万余人被捕，分别被囚禁在监狱和秘密集中营内。我在第一临中被捕，王大彤同志也列入黑名单，在逮捕他的时候，恰巧不在家，他闻讯立即奔向立达中学，在蔡老的掩护下，度过一夜。因立达是个私立的规模小的中学，在那里也不安全。次日蔡老又把大彤同志转送到齐鲁大学杨德斋先生处（日寇投降后，齐大复校，杨回校仍任总务长）。齐鲁大学有美国教会作后台，反动派是不大敢轻易触动的。在齐大大彤同志躲了一个时期。后来，找了曾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成了国民党的游击队司令、当时是王耀武的少将参议的杨明章。杨明章总算是天良未泯，由他掩护着，大彤同志奔向解放区，脱离了险境。蔡老和杨德斋送走大彤同志之后，立即设法营救我。他们不顾年岁已高，冒着酷暑烈日，东奔西走，联系亲友，多方探听消息，反复研究营救方法。后来，蔡老联合了立达、正谊、懿范、黎明、齐鲁等五个中学的校长和教务主任以及名教员共21人，上书国民党当局保释我。那篇呈文是蔡老与好友研究后亲自写的，我被囚禁在集中营中，与外界断绝联系，没有见到呈文原文。事后，据我的好友告诉我，蔡老为写那篇呈文真是费了心血。呈文措词得当，不能过于激烈，担心刺激了反动派会招来不良后果，又不能哀哀求饶，有损我们的气节，而且要按照官场的公文格式来写。到了8月，因反动派抓不住给我定罪的真凭实据，我终于被保释出来。我到蔡老的府上去感谢他，当时见面悲喜交集的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我再三向蔡老表示感谢，

蔡老却说：“鸣岗，不要说了。你遭了事，我能不管吗？我们之间，用不着说‘谢’字。”接着喟然长叹，又说：“看来，和平无望，这个仗非打到底不可了。我只是担心王大彤，不知他的身体怎么样了？但愿我们能早日重新见面！我想，总会比八年抗战的日子短吧。”

果然，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了，大彤同志立即回来，我们欢天喜地重新会面了。紧接着，这年10月初，大彤同志、蔡老和我同时受济南市政府的任命，各自去主管一个中学。大彤同志任华大附中（原第一、第二临时中学合并而成）校长，蔡老任济南第三中学（原第三、第四、第五临时中学以及流亡到济南的县城中学合并而成）校长，我任扶轮中学（铁路局办的，后改名为铁路职工子弟中学）校长，立即开始了复课和对旧学校的调整改造工作。因为各人忙于自己的业务，相互接触的机会反而比以前少了，但是彼此还是十分关心的。1950年，党调我到民政局兼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1955年济南市政协成立，党又调我到市政协专职驻会，从此不再作教育工作。但是蔡老作为教育界的代表人士，经常出现在广大的群众集会场合，所以我们还是经常见面的。据我所知，蔡老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都是热情参加，表现积极。平时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改造自己的旧思想，全心全意地跟着党走。记得在“五反”运动中，在一次体现党的宽大政策的集会上，蔡老作为教育界的代表人士发了言。他的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今天，台上（指大会主席团）台下（指一部分因抗拒运动受处分的工商业者）都有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发了言。你若听党和政府的话，坦白交待你的‘五

毒’行为，你就是‘座上客’，反过来，你就是‘阶下囚’。你们各位都看清楚了吧？我活了六十多岁了，满清政府、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当权的时代我都经历过。只有解放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才是真正的人民政府，真正的言行一致的政府，真正说了话算数的政府，真正取信于民的政府。今天的事，就说明这么一个问题。我劝各位回去认真想想自己今后到底怎么办？千万不要用老眼光看新政府了。‘老皇历’不能再翻了。我不是佛教徒，但是，今天我要借用佛经上的一句话奉送给诸位，那就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听者为之动容。运动结束后，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工商业者说：“我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宽大处理。我之所以有今天，首先是党的政策的英明伟大，但我也要感谢蔡老先生，那一次的大会上，蔡老的讲话，真正触动了我的思想，从此，我才开始交待自己的问题。”

1957年初，蔡老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随之被推选为民主促进会济南地方组织的负责人。接着，“反右”斗争的风浪起来了，通过这一风浪的考验，蔡老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1960年初，蔡老患老年性脑动脉硬化症，从此长期卧床，不能继续工作，但老人家在病榻上仍关心祖国的教育事业和亲友。“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冲击了这位久病的老人，红卫兵“清四旧”抄了他的家。对此，老人家并不埋怨，坚信党会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些问题的。蔡老病逝于1989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无法在老人临终前再见面，这是至今思之仍感痛心的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蔡老的遗愿实现了，1980年党和政府在济南英雄山烈士纪念堂为蔡老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蔡老逝世至今已20年了，但蔡老的高风亮节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选自《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略有改动）

回忆1902年——1916年

的山东师范学堂

慕际露 遗作

一、山东师范学堂监督概况

清末的教育由封建的科举变为学堂，但仍然是封建式的，教育权仍握在官僚手里，学堂所有监督都是府道班子官员充任。山东师范学堂历任监督亦是如此，他们中有的出身，以懂新政为标榜，把办学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有的是科甲出身，以腐臭的功名科第自负，反自封为识时务的维新人物。他们都不是山东人，因而无有办地方教育事业之心。王诤之所以被委为师范学堂监督，是因他是山东解元，朝考授民政部主使的头衔，才得委任的。这是把山东高等教育权交给山东人自办的一个创举。赵正印也是以山东解元，朝考知县的资历，方得到提学使司的学务科差使来代理监督的。清朝政府委任监督的主要用意，是怕学生们进入学堂后学洋学，会离经叛道，闹革命党，故把高等教育权交在官僚手里，便于监督学生。

学堂的监督只重视科举的功名，不重视学堂毕业奖给的功名（洋功名）。试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是光绪三十三年三月所考的初级完全班，该班于三十四年二月以学生年龄、家境不齐为理由，要求改习初级简易二年班（按章规定：师

范速成是一年，简易是一年半，完全是三年）。呈请学校，后被批准。实际原因是清朝因科举已停，为给廪、增、附生谋出路，能参加优、拔贡生的考试。因为三年制的在校生有奖给贡生的规定，中途不准应考贡生，故改为二年。这样上下相欺，出了一个二年简易班。二是宣统元年所招的初级完全班，定为肄业五年。因为都是小学毕业生，小学虽奖给了廪、增、附，却不能和科举功名享受同等待遇。实际上这些学生都是停科举的那一年参加了县府考的案首和前几名，后又入了小学上了四年，但其待遇还不如一个监生。这增加二年的学习有什么教育意义，只消磨青年的光阴，贬低小学毕业的价值而已。

师范学堂的监督在职时间都很短，自1903年——1911年的9年间，更易监督16人次，其中任期最长的为1年又6个月，最短的为2个月，平均每人任期是6个月零12天。五日京兆的官僚，哪能做出长远的改良教育计划呢？

二、山东优级（含高等）

师范学堂毕业生的类别和班级

1912年，北洋政府决定将裁撤的存古学堂，并入山东优级师范学堂，改称为山东高等师范学堂。从1902年创立到1916年停办，培养了大批有才华的学生。其毕业生的类别、班级有：

（一）优级师范与高等师范时期，共分四类十二个班，均为三年毕业。外国语（英语）：第一班（优师），第二班

(高师)。历史地理：第一班(优师)，第二班(优师)，第三班(高师)。物理化学：第一班(优师)，第二班(优师)，第三班(高师)，第四班(高师)，第五班(高师)。博物：第一班(优师)，第二班(高师)。

(二)公共科为各类的预科：共十二班，一年毕业。

(三)专修科：体育专修科一班，二年毕业。

(四)速成班：甲班一班，一年毕业。

(五)简易班分为三期五个班：一期简易班：甲班、乙班、丙班，一年半毕业。二期简易班：一个班，一年半毕业。三期简易班：一个班，二年毕业。

(六)完全科共四个班：头班、二班、三班、四班(原存古学堂学生改编而成)，三年毕业。

三、山东师范学堂的经费

学校经费一向是不公开的，所有教职员学生也从不过问，也无权过问。学校所有文件中也没有经费使用的记载，故无从查考。仅就知道的一二件事记在下面：

凡各县送考一个师范学生(名额是上级指定的)，须由县解交藩库纹银60两，以后每年成为定额，每届学校招生须查有缺额时才飭该县送考。这时省城各校学生都是官费供给，并无此例。

学生的膳费是不一样的，在分配上按考试成绩分列等第。成绩(每学期考的)列90分以上的，每月是一两六钱纹银；80分以上的是一两四钱；70分以下的是一两二钱，除去伙食，剩余的伙尾发给本人。手续由瑞蚨祥开银条子，经班

长分发，各人再向该号兑取，正副班长每月有补助费一两，学生请长假的扣发伙尾。新生入学一律发一两二。这种采取书院每月领膏火的办法，名为鼓励，实则数日不划一，易于上下欺瞒。学生领取时也不要学生的领据。

学堂的报销和交代，用什么证据，即由经理商办理。监督常常更换，经理商是永远不换的。报销交代中只要合例，上级也不挑剔。至于前任亏空，后任弥补，在师范开创过先例。

(1) 王訥任内正是辛亥革命山东独立时期，独立取消后，革命分子赴烟台继续发动革命，在学校经费中提取了活动费，致亏空7000余两。后来王请任山东临时省议会副议长，被选举为国会众议院议员，这笔款遂压在学校经费账上。

(2) 徐鸿策任校长时，不善于处理经济事务，加上用人有些不当，内部发生了矛盾。这时徐昌言是斋务长，有管理经济的责任，两人工作上不能合作，徐鸿策以学校经费困难要裁减职员为理由，面辞徐昌言。昌言却说：咱个人间有什么不合适之处吗？既然没有，只是为的经费困难，我可以一年不支薪，帮忙到底，以后果然如此执行。但徐昌言对审查不实的财经报表却不盖章，后徐鸿策被人以“乱用学校经费”告发，教育司派人查核，徐昌言即献出一个单子，单子上列有70多条报销不实的事。教育当局只好将徐鸿策调第五中学任校长，并按照学生们的请求委鞠思敏任高等师范校长，徐昌言仍任原职，饭堂管理上也改变了过去包伙办法，由学校自办，减为只供馍馍咸菜、稀饭，裁去伙尾，徐自任管厨。这种用新土填旧坑的做法，使学校得以继续发展，财政公开也上了轨道。这种办法是比较合乎学生心理的。